

# 海外汉学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sup>\*</sup>

## ——关系分析与策略思考

袁丽梅

(上海大学, 上海 200444)

**提 要:** 在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 如何将优秀的中国文学作品介绍出去, 本土译者责无旁贷, 然而, 海外汉学、汉学家在其中应扮演怎样的角色。本文从译介对象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作的接受与传播等方面简要梳理汉学发展与中国文学外译活动间的关系, 在此基础上认为汉学应成为中国文学“走出去”的重要推动力量, 并建议从尊重汉学家差异性解读、鼓励本土学术研究、建立学术自信与发挥华裔汉学家融通作用等方面最大限度借力汉学发展以推动中国文学向外译介与传播。

**关键词:** 汉学; 中国文学; 翻译

中图分类号: H31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0100(2018)05-0018-5

DOI 编码: 10.16263/j.cnki.23-1071/h.2018.05.004

### Sinology Promotes the “Going 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Relation Analysis and Strategy Design

Yuan Li-mei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The “going-out” strategy mainly relies on Chinese translators to introduce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o the world. However, as the scholars who are not only studying Chinese culture and society, but also translating Chinese classics and contemporary works, sinologists should be highly regarded and made good use of.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inology and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literary works from three perspectives, and furthermore proposes strategies to push forward the “going-out” of Chinese literatur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inology.

**Key words:** Sinology; Chinese literary works; translation

#### 1 引言

“翻译是一种文化传播, 在任何翻译活动中都会存在规划行为。”(董晓波 胡波 2018: 86) 海外汉学发展与中国文化外译活动之间长期存在着糅合共生的关系。自产生之初, 汉学(Sinology)的发展便与早期汉学家们对中国社会、文化、科技、政治和文学等领域著作的翻译活动密不可分。19世纪初, Sinologie(汉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法国确立, 原因正在于18世纪法国传教士著书立说、翻译中国文献、向欧洲介绍中国的卓越努力。

而汉学在不同时期的发展也直接影响着中国文化的向外译介与传播。二战后, 费正清(J. K. Fairbank)开创的“地区研究”(regional studies)模式将近现代中国作为汉学关注重点。1974年, 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与社会科学理事会召开“关于优先考虑中国研究的规划会议”, 一致认可“以后10年一定要继续采取以发展当代中国研究为主的方针”, 使得汉学研究进一步向中国的现当代倾斜(宋绍香 2012: 71)。在这一背景下, 中国新文学作品在美国的翻译与传播活动空前活跃, 至80年

\*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科青年项目“中国文学‘走出去’的汉学语境研究”(2017EYY002)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翻译规范的中国应用翻译批评及标准体系研究”(17BY046)的阶段性成果。

代初,美国已新增中国新文学译品“约八十种”(同上:72)。与此同时,中国文学作品的不断翻译、出版也为海外汉学的发展提供新的研究对象与研究发现的新可能。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A. Lefevere)将影响翻译行为的文本外因素概括为“意识形态”(ideology)与“诗学”(poetics)两方面,其中以高校教师、研究者和批评家为代表的“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决定着文学经典化的过程,进而对某一阶段的“诗学”施加巨大影响。汉学发展至今,汉学家主体已由早期的传教士、来华官员向职业汉学家转变。汉学的学科地位已经确立并成为高校中一个重要的学术研究方向,汉学家对中国文学形态、特征、发展、流变的思考需要借助并将激发促进中国文学作品的译介传播,这种糅合共生的关系成为进一步思考汉学发展如何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的前提和基础。

## 2 汉学发展影响中国文学外译活动

具体而言,汉学发展对中国文学外译活动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3个方面。首先,译介对象的确定。选择哪一时期、哪一流派的哪位作家、哪部作品进行翻译介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翻译活动发生时汉学发展的总体面貌与主导趋势或汉学家个人的研究兴趣。当然,这种研究兴趣在大多数情况下与汉学界对中国问题的关注焦点基本一致。以沈从文小说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根据徐敏慧的梳理,在20世纪30、40年代,也就是沈从文小说英译的第一个阶段,翻译活动较为分散,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当时普遍认为中国现代文学“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徐敏慧2010:223)。1961年,夏志清出版《中国现代小说史》,重新评价沈从文的文学成就;随后,金介甫(J. Kinkley)、威廉·麦克唐纳德(W. MacDonald)与安东尼·普林斯(A. Prince)3人有关沈从文研究的博士论文面世,促使这位一度湮没无闻的中国作家成为70年代以后以美国汉学界为代表的对中国近现代文学关注的焦点。而在随后70、80年代的翻译活动中,沈从文作品的文学价值受到高度重视;同样得益于相关研究的推动,翻译选材时也兼顾到对沈从文文学创作整体面貌的反映。正如金介甫所言“选择哪篇作品进行翻译需要做出价值判断。首先是作品的文学价值……并重点关注那些以前未被译成英语的沈从文的小说”(同上:224)。此外,他还谈到“有些译本参考过多种不同的原作版本,且倾向于选取较长的版本,以保证

译文全面反映原作的思想”,这一对待原作的态度在30、40年代以故事性作为翻译文本选择的主要标准的译介语境下是难以想象的(同上)。

其次,特定时期汉学家们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和文学等的基本态度和看法也左右着译者在译介中国文本时采取的主要翻译策略。1913年,李提摩太(R. Timothy)翻译的《西游记》英译本(*A Mission to Heaven*)出版,据相关研究,译者采取全译加缩译的翻译方式,对第一至七回进行全译,第八至九十七回(第十一回除外)——这个部分主要描述唐僧师徒经历的81难——进行缩译;同时,改造书中主要的人物形象,使“原罪意识、救赎观念代替小说原本的佛教业报与解脱观”(胡淳艳 王慧2012:247)。正如译作书名所示,李提摩太在翻译过程中,将《西游记》文本与基督教精神进行比附,体现出译者“以耶释佛”的特殊翻译策略(同上:250)。其背后的原因当然如研究者所指出的,受到李提摩太对佛教与基督教关系的独特认识的影响,即他认为佛教是基督教的“东方表述形式”,可通过基督教义对佛教进行解读和“重新架构”(同上:243)。从更加宏观的层面来看,传教士构成早期汉学家的主体,他们来到中国、研究中国的首要目的是传教,而其对待中国文化的基本态度则是“企图用西方文化来同化中国”,李提摩太在此背景下采取大刀阔斧的翻译策略,原因亦不难理解(王晴佳2006:369)。

最后,在译作的接受与传播方面,掌握着学术话语权的汉学家无疑将发挥其“专业人士”的作用,通过相关研究、评论推动译作进入更多读者和研究者的视野,进而扩大译作在译入语文化环境中的影响力。2009年,晚清小说《风月梦》的首部英译本出版,译者是韩南(P. Hanan)。这部创作于1848年的言情小说一直以来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关注甚微,然而其英文译本面世后却广为传播、广受好评。这部在中国文学史上几乎默默无闻的作品能够成功地走入西方读者视野,其中发挥着决定性作用的便是它的译者韩南。韩南的译本“考证到位、严谨细致、清异秀出、文笔晓畅”,但更重要的是,同时作为知名汉学家的韩南早在上世纪90年代便开始潜心研究《风月梦》,并在《哈佛亚洲研究杂志》上发表《〈风月梦〉与烟粉小说》一文,对《风月梦》的文学艺术价值进行挖掘,也为后期译本的传播做好铺垫与准备(同上)。

以上通过个案从译介对象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作的接受与传播3方面概述汉学发展对中国文学外译活动的影响,其中所涉翻译活

动的主要实施者与参与者均为外国人,包括数量众多的汉学家。汉学家译者在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历史进程中发挥过举足轻重的作用。诚如张西平所言“在中国文化的西方传播进程中,国外汉学家起到根本性的作用,正是由于他们近四百年的不懈努力,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已被翻译成各种西方语言”(张西平 2014: 86),同时,汉学家“大多中西方文化底蕴深厚,精通两种语言,确保译文的高质量和可读性”(王燕华 2016: 79)。当然,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与文化意识的觉醒,这一文化传播模式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变化之一即中国本土译者群体的不断扩大。当前,在中国文化积极“走出去”的时代背景下,有着明确的自主意识、同时肩负着伟大民族使命的本土译者对译介对象和翻译策略的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将不再受制于海外汉学的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对外译介推广中国文学可以完全绕开汉学语境。事实上,本文认为,中国文学要想成功地“走出去”,必须借助海外汉学这支重要力量。

### 3 借力汉学发展推动文学外译

尽管如前文所述,中国文学外译的译者主体已由海外汉学家转变为中国本土译者,然而,众多研究表明,本土译者的译文尽管语言流畅、文字优美,且对原文的忠实度高、较多保留中国文化特色,但在译入语国家的接受与传播状况却令人堪忧,与一些汉学家译者的译文相比也是稍逊一筹。不少学者也注意到这一现象,进而认为“比较明智的做法是建立起让西方汉学家和中国本土译者‘中西合璧’的合译模式”(胡安江 胡晨飞 2012: 57)。而之所以选择“合译”的一个主要原因则在于“汉学家单兵作战的翻译模式”可能受到个人兴趣爱好、研究视野,甚至商业利益等的影响而产生不良后果(同上)。对这一问题,我们或许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待。按照解构主义与阐释学派的想法,翻译活动,尤其是文学翻译活动中,忠实性是一个值得商榷的概念。解构主义消解一切中心、权威,自然对原文本中存在的、翻译行为尝试还原再现的文本意义深表怀疑。阐释学派则直接否定作者意图的重要性,认为文本意义的建构主要来自读者的阅读与阐释行为,从而允许译者在翻译活动中彰显主体性。本文无意推翻忠实性这一由来已久的翻译标准,但认为在文学翻译中,对原文的解读和再现并非只有一种方式,而应该鼓励多种可能,当然,恶意扭曲、篡改原作不能容忍,下文也将另作说明。汉学家顾彬曾在一次访谈中

谈到“可能会有人说我(对唐代诗歌、宋代散文)理解得不够,这个我当然承认。但是这其中的原因是因为杜甫、苏东坡等人的思想太深刻,也太复杂的缘故,可能我一辈子没办法完全了解。话又说回来,可能中国国内的学者也没有办法完全理解这些古代的文学家”(李雪涛 2014a: 53)。既然理解存在多向性,且单一的理解行为无法涵盖一切可能,那么,差异化的解读越多越有助于揭示或者构建事物的完整面貌与丰富内涵。

更何况,文学翻译活动不会因为无法深入、准确、完整地把握原文思想而停止,在失去(loss)的同时,我们亦有所收获(gain)。翻译使特定文本在新的语言文化环境中重获新生,这“第二次生命”由于与译入语国家社会历史文化因素的紧密结合而愈发生机勃勃,反之则逐渐凋零,中国近现代对西方文学的译介历程中不乏相关实例。谢天振在探讨中国文学如何有效“走出去”时曾指出:“在严复、林纾那个年代,我们国家的西方文学、西方文化典籍的读者是怎样的接受水平:译自西方的学术著作肯定都有大幅度的删节……明乎此,我们也就能够理解,为什么当今西方的翻译家们在翻译中国作品时,多会采取归化的手法,且对原作都会有不同程度甚至大幅度的删节”(谢天振 2014: 9)。这段话关注的焦点是如何根据普通读者的接受水平选择恰当的翻译策略,然而,论者在其中采用的换位思考方式却引人深思。回顾西方文学自近代以来在中国百余年的传播历程,删减、修改、误译现象比比皆是,许多作品,如小仲马的《茶花女》、雨果的《悲惨世界》等,却在新的社会历史文化语境下获得原文本意想不到的新意义。这是不仅关乎语言、文字,更与文化传统、社会现实紧密联系的翻译活动的必然结果,也是文学文本经由译介重新获得的“第二次生命”。

相较于其他译者,汉学家的翻译活动与其对中国社会、历史、文化的研究工作密不可分,且由于汉学的特殊性——“它以‘中国文化’作为研究的‘客体’,以研究者各自的‘本土文化语境’作为观察‘客体’的基点”,汉学家译本因此成为中西文学、文化交流对话的微缩载体(严绍盪 2006: 8)。汉学是“西方学术的一部分”,而非“中国学术在域外的延伸”(李雪涛 2014b: 71)。那么,汉学家在对中国文学的翻译过程中出现差异性解读便是可以预见,并且应当被理解和接受。更何况,这种差异性解读正是中国文学进入并且影响异质文化的契机与突破口。元剧《赵氏孤儿》在18世纪经由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伏尔泰翻译、改写为

《中国孤儿》(*L'Orphelin de la Chine*)，译本虽在情节方面进行大幅调整，改编后的剧本演出却大获成功，“标志着伏尔泰的启蒙主义理性与儒家伦理道德成功融合，征服西方文化”，也极大推动中国文化在西方世界的传播(吕世生 2017: 93)。有论者指出，“中国的文明已经渐渐成为其他文明的重要参照系统，他们当然有权利按照自己的方式对中国文化提问和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文化不再只属于中国，而是属于整个世界，从而凸显中国文化的全球性意义”(李雪涛 2014b: 72)。反过来讲，以汉学家为代表的西方学者、读者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钻研其中并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正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辐射世界性影响力的反映。于是，与其对汉学家在其译作中是否准确再现中国文化这一问题苦苦纠缠，我们似乎更应该关注汉学家们是否仍在译介、以何种方式译介以及为何采取这样的方式译介中国文学，也即关注中国文学是否正在参与以及如何参与他国文学、甚至世界文学的发展进程。

汉学作为一门系统学科在19世纪初确立以来，历经多个发展阶段。目前，随着中外交流的深化扩大与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汉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呈现出日益重视中国话语的倾向。因此，尽管前文详细论述以汉学家为主体的中国文学外译活动中差异性解读的必然性与必要性，但该论点的一个重要前提便是当前汉学发展的总体趋势和特点使得这种差异性解读不会再出现如传教士时期或麦肯锡时代的对中国文学的肆意篡改和任意描述。“海外中国研究的原始资源和基本资源无疑来自中国。在彼此关系上，以往的中国多处于一种被动状态，被静观式地研究……在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国际反响姿态渐趋主动和自觉，有意识地对海外中国研究做出越来越多的反馈，这种反馈的力量也已经深刻影响海外中国研究具体成果的国际地位……作为资源和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已经以一种对话者、互动者、利益攸关者或者干脆说一种权力拥有者和批评权威者的多重身份，全面介入海外中国文学研究的力量和利益格局中。海外中国研究者不再满足于获得作为原始资源的中国，更要获得中国反响的积极支持，并且后者还成为他们最重要的现实资源。”(吴俊 2015: 14-15)从这个层面上看，过去常常受到海外汉学影响的国内学术界与文学界或许可以考虑采取更加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到海外汉学对中国的关注与研究活动中，通过与后者日趋平等的对话交流，反向影响海外汉学的研究焦点、

视角、路径、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等。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与中外交流的日趋广泛、深入为中国学界介入并影响海外汉学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当前的汉学发展已不可能完全无视其研究对象，即中国自身的回应与反馈，因此，不仅肆意扭曲中国形象的做法很难再在学术界大行其是，中国知识界、文艺界还有可能通过学术对话和项目合作等形式深入影响海外汉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事实上，从历史的角度看，海外汉学研究的相当一部分发现背后均有着一段与中国学界对话并受后者启发、促成新研究成果的鲜为人知的故事。例如著名的“寒山诗”，其价值与意义被海外汉学家发掘，转而在80年代以后影响国内相关研究。殊不知，寒山诗进入海外汉学家的视野正是得益于中国学界的启发。据考证，寒山诗最早的英译并非发生在1954年，译者亦非英国汉学家韦利(A. Waley)，而应提前至20世纪30年代，译者为美国汉学家哈特(J. Hart)。而“哈特之所以选译寒山诗，很可能和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对寒山的重视有关”，在《白话文学史》中，胡适“将寒山与王梵志、王绩三人并列为初唐三位白话诗人”(耿纪永 2012: 45)。哈特在译介寒山诗的中诗英译集《百姓》(*The Hundred Names: A Short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Chinese Poetry with Illustrative Translations*)中特别提到胡适，并有迹象表明他曾阅读过《白话文学史》。由上例可见，除直接的对话交流、协商合作外，中国学界与海外汉学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隐性的、间接的影响模式，某位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或学术观点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汉学热点的源头。张隆溪也指出，“今日海外的汉学家们已经不能继续忽略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中国和海外学术的互动交往已经越来越频繁”(张隆溪 2016: 4)。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学界在对待自身的文化与文学现象时更需要建立学术自信与自觉，通过扎实的研究工作、新颖的研究发现与自信的学术姿态加入全球范围内对中国问题的研究中并对施加积极、正面的影响。

此外，在思考海外汉学如何助力中国文学“走出去”这一问题时，华裔汉学家的作用不容忽视。二战后，赴美留学与移民的中国人日益增多，华裔学者成为海外汉学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汉学发展也产生深远影响。吴原元通过详实的梳理20世纪40年代包括杨联陞、刘广京、萧公权 and 袁同礼等一批赴美华裔汉学家对美国汉学整体发展的影响，并从培育美国汉学的基础、矫正美国汉学发展中的流弊与开拓美国汉学研究的新领域3个

方面深入讨论上述影响关系(吴原元 2010: 31)。其中特别提到二战后,美国汉学界在研究中国历史、文化时往往会有“首先设定‘假定’,然后搜寻资料来‘证明’所设的假定”的错误做法(同上: 35)。对此,萧公权花费数年,苦心孤诣写就《十九世纪中国乡村》一书,其中整理、翻译大量原始资料,作者希望藉此传递出一种“历史性的而非理论性”的处理中国问题的方法,纠正上述流弊(同上)。这些研究均从历史的角度肯定华裔学者对海外汉学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时也启发我们思考如何在借力海外汉学促进中国文学“走出去”时充分发挥华裔汉学家在其中的影响作用。华裔汉学家,不论是移民后代,还是在中国本土接受教育后定居海外并继续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由于集体意识、家族渊源、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等因素的影响,他们在对中国文化的体认与感知方面具有天然的优势;同时,他们又接受西方的学术话语体系,在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上与其他汉学家无明显隔膜。因此,就汉学这门以中外对话、交流作为其本质属性的学科而言,华裔汉学家正是集中实现中西对话、融通的个体平台,由此,他们也在20世纪以来汉学发展的各个重要阶段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 4 结束语

历史上,在译介对象的确定、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译作的接受与传播等方面汉学发展均对中国文学外译活动产生过巨大的影响,当前中国文学致力于“走出去”,更加不能忽视汉学这一日益完善的学术体系对中国文学在世界范围内接受与流通的影响力。同时,我们也应重视中外交流这一汉学的本质属性以及中国文学“走出去”语境下中国文学成为全球关注对象与世界性话题的趋势,尊重文学文本在不同语言、文化传统中传播时将产生多样化、差异性解读的客观规律,鼓励本土学界对自身文学、文化现象的发掘、研究,以更加自信的姿态,在更为广泛的层面上与海外汉学进行对话,并合理发挥华裔汉学家在其中的润滑与衔接作用,从而在最大限度上借力汉学发展推动

中国文学“走出去”。

#### 参考文献

- 耿纪永. 远游的寒山: 英译第一首寒山诗[J]. 中国比较文学, 2012(2).
- 胡安江 胡晨飞. 再论中国文学“走出去”之译者模式及翻译策略——以寒山诗在英语世界的传播为例[J]. 外语教学理论与实践, 2012(4).
- 胡淳艳 王慧. 佛耶之间——李提摩太《天国之行》的翻译传播[J]. 明清小说研究, 2012(4).
- 黄晓波 胡波. 面向“一带一路”的我国翻译规划研究: 内容与框架[J]. 外语学刊, 2018(3).
- 李雪涛. 对新世纪汉学研究的几点思考[J]. 北京联合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4a(1).
- 李雪涛. 与顾彬对谈翻译与汉学研究[J]. 中国翻译, 2014b(2).
- 吕世生. 中国传统戏剧“西渐”的误读与认同——以英译本《戏剧之精华》为例[J]. 外语学刊, 2017(2).
- 宋绍香. 中国新文学反映20世纪中国发生的革命变化——美国中国现代文学译介、研究概观[J]. 文艺理论与批评, 2012(4).
- 王晴佳.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述评[A]. 欧美汉学研究的 历史与现状[C]. 郑州: 大象出版社, 2006.
- 王燕华. 经典的翻译与传播——《诗经》在英国的经典化 路径探析[J]. 上海翻译, 2016(2).
- 吴俊. 走向世界: 中国文学的焦虑[A]. 当代文学的世界 语境及评价[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5.
- 吴原元. 略论20世纪40年代中国赴美学者对美国汉学 的影响[J]. 华侨华人历史研究, 2010(2).
- 谢天振. 中国文学走出去: 问题与实质[J]. 中国比较文 学, 2014(1).
- 徐敏慧. 沈从文小说英译述评[J]. 外语教学与研究, 2010(3).
- 严绍盪. 我对 Sinology 的理解与思考[J]. 世界汉学, 2006.
- 张隆溪. 论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翻译与传播[A]. 国际汉 学研究通讯[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6.
- 张西平. 中国文化外译的主体当是国外汉学家[J]. 中外 文化交流, 2014(2).

定稿日期: 2018-08-18

【责任编辑 谢群】